



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访谈

□李若虹* 郑炯文

摘要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荣休之际,哈佛燕京学社李若虹博士对他进行了访谈。郑炯文馆长回顾了自己管理美国顶尖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历程,分享了自己从事图书馆事业数十载遵守的两条准则:保证藏书质量和全心全意为学者提供一流的服务,并介绍了燕京图书馆为了满足信息时代的需求,在过去的20多年所经历的变革和创新,以及最终如何发展成为一家能在21世纪为哈佛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师生、学者提供一流服务的研究型图书馆。除了改进馆藏结构,提高服务质量以外,郑馆长还在任期内着手启动了两个大的项目:访问图书馆员项目和善本书数字化项目,此举不仅推动了图书馆的国际合作进程,而且弥补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业务上的不足,使得馆内珍藏本以电子版的形式能为世界各地学者所利用。

关键词 哈佛燕京图书馆 郑炯文 藏书 读者服务 善本书 数字化 访问馆员

分类号 G259.1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5.001

哈佛大学郑炯文馆长领衔哈佛燕京图书馆二十余载后,2020年底荣休。在他即将离任之际,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李若虹博士对郑馆长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郑馆长回顾了自己管理美国顶尖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职业历程,强调了自己从事图书馆事业数十载遵守的两条准则,并分享了他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期间,馆内经历的变化和改革。

郑馆长年轻时入学芝加哥大学,接受了东亚研究兼图书馆学的联合专业项目的培训。他在目录学家钱存训先生(1910—2015年)的提携下,接受了图书馆学的严格训练后,继任钱先生,担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多年。之后,他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负责管理该校东亚图书馆。1998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Eugene Wu)馆长卸任后,郑炯文从加州前往哈佛大学,出任燕京图书馆近百年史上的第三任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多达160万册,包括汉、日、韩、越南、满、蒙、藏等12个语种的藏书资料,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内70多家图书馆中的第三大馆,也是北美东亚研究最大的研究型图书馆。

在50年的图书馆生涯中,郑馆长始终坚持两条

准则:一是保证藏书质量;再就是全心全意为学者提供一流的服务。郑馆长走马上任燕京图书馆馆长后,先全力以赴清理馆内积压的库存,重新整理善本部的藏书及其目录。继而,他和哈佛大学图书总馆密切合作,顺利完成了燕京图书馆从传统的卡片编目系统到电子系统的转型,使燕京图书馆得以满足信息时代的需求,成为一家能在21世纪为哈佛以及世界各地的师生、学者提供一流服务的图书馆。

除了改进馆藏结构,提高服务质量以外,郑馆长在任期内还着手启动了两个大的项目:访问图书馆员项目和善本书数字化项目。前者不仅推动了图书馆的国际合作进程,而且弥补了燕京图书馆业务上的不足,而后者使得馆内珍藏本能以电子版的形式为世界各地学者所利用。

以下是李若虹博士对郑炯文馆长访谈内容的辑录。访谈原文为英文,为发表需要,作者对中文版的内容稍作编辑和修改。

李若虹:

郑馆长,感谢您抽空接受我的访谈。首先祝贺您荣休!祝贺您在过去的22年里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取得的成就。回顾您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

* 通讯作者:李若虹,ORCID:0000-0002-1236-6574,邮箱:ruohong_li@harvard.edu。



馆长的这些年,请和我们分享图书馆经历的至关重要的变化和进步。同时,也请您分享一下您作为专业图书馆长的职业历程。

郑炯文:

好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燕京图书馆经历的最大变化首推技术革新。电子邮件的使用、信息资源带来的电子化和数字化,都给图书馆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我本人的职业生涯其实非常简单,一路通坦。我早年接受过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然后做了一辈子的图书馆员。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东亚研究兼图书馆学的联合专业项目。毕业后,我的图书馆生涯从芝加哥大学开始,一辈子仅在三家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任职。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继任我的导师钱存训先生,担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我非常幸运,27岁就进入东亚图书馆学领域。我那时的同行包括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吴文津(Eugene Wu)、万惟英和卢国邦(Karl Lo)等。霍华德先在康奈尔大学任职,后来调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吴文津是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任,继裘开明之后担任燕京图书馆馆长。万惟英是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东亚馆馆长。而卢国邦先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后来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工作。这一批老图书馆员现在或是过世了,或已年迈。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12年之后,转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理查德·鲁道夫东亚图书馆馆长。1998年,我开始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三任馆长,迄今已有22年。

李若虹:

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担任燕京图书馆馆长期间最值得记忆的时候?

郑炯文:

我在这家图书馆任职期间确实留有一些非常值得回忆的时候,但是这些并非我一个人独有,而都是我们的团队精诚合作的成果。我总是说自己此生有幸,因为在我工作过的三家图书馆里,都遇到了特别好的同事们。我能完成的所有一切都来自团队的努力。我并不谦虚地说,这些年我们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确实做了不少事儿,但是所有这些成绩都归功于图书馆里我的同仁们。我非常有幸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团队中的一员。

李若虹:

郑馆长谦虚了。您这些年确实在燕京图书馆做了很多事儿,作为燕京图书馆的常客,我们都有目共睹,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感谢!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代表学社的所有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生,还有我们学社的同仁提问的,每年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完成1年的访学,行将回国时,我们会向他们征求意见,提供对有关学社的项目、有关图书馆的服务等的反馈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是他们在哈佛大学访学研究期间最有价值的,年年如此。现在您即将离任,能否对我们学社的学者们说几句话?

郑炯文:

这些年里,每年我和图书馆的同仁们都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有三次见面交流的机会。第一次是在9月份,也就是他们刚到哈佛大学安顿下来不久。秋季学期结束后,我们会安排第二次座谈会。那是一学期后,他们已经有了使用图书馆的亲身经历,我们想了解他们是否都能顺利找到所需的资料和书籍,他们的研究需求是否都能得到满足,图书馆馆藏还有什么薄弱环节需要弥补的,另外,我们馆员的服务是否到位等等。而最后一次面谈通常在5月或是6月,也就是他们完成了一个学年的研究,打道回府之前。得知学者们都认为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做研究是他们在哈佛大学一年最有价值和最具意义的经历,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最后一次信息反馈会上,我总是告诉学者们,即便回去了,他们如需什么资料,需要帮忙,我们还会尽力协助提供。

李若虹:

非常感谢郑馆长!我相信学者们肯定还会向你们求助的。我们学社里的同仁也非常感激您的关照。下面我想了解的是在您的引领下,燕京图书馆在过去的22年里经历了很多变化。1998年,您刚来燕京图书馆时,我们才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燕京图书馆还在使用纸质卡片来登记每一本书的流通信息。我清楚记得,每次来借书,总得花很多时间填写白卡和黄卡,一式两份的卡片,一一写下书的信息等等,借书程序繁琐,很花时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网上索取和通过电子邮件递送电子版书籍的服务。当初您是怎么认识到,燕京图书馆需要彻



底改变那种传统的、低效率的借阅制度?燕京图书馆又是如何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革来满足 21 世纪的学者所需?

郑炯文:

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使用对图书馆来讲,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燕京图书馆也不例外。你提到的白卡、黄卡这些登记书籍借出信息的老办法早已成为历史,原有的包括汉、日、韩文书籍,也有越南文、满文、蒙古文和藏文书籍在内的 80 万册书籍的目录卡片系统早都不在了。我们的整个目录系统已经通过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和哈佛图书馆线上系统(HOLLIS)完全电子化了。今天,不管在世界何地,人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燕京图书馆的藏书信息,这已经有好些年了。自从图书馆开始使用网上目录系统以来,燕京图书馆藏书的使用量陡增,因为我们不再仅仅为哈佛大学的师生和学者服务,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服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里,燕京图书馆已成为一家拥有第三大藏书量的图书馆,仅次于怀特纳图书馆和法学院图书馆。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3 月中以来哈佛图书馆系统一直关闭,大量外借的书籍还到了馆内。现在统计下来得知,燕京图书馆的书籍流通量在大学的 72 家图书馆中位居第三。

但是,话要说回来,在今天数字化和电子化的时代,我认为仅数字本身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藏书质量和如何使得这些藏书能尽其所能为学者所知、所用。这又回到了我反复提到的办好一家图书馆的最重要的两条原则,即藏书和服务。

李若虹:

我对您担任馆长期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转型非常感兴趣,也就是图书馆从传统的纸质卡片目录系统到网上检索目录系统的转变。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燕京图书馆一定得改变以前那种旧体制来适应和满足 21 世纪的研究所需?

郑炯文:

其实,来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之前,我就意识到图书馆系统需要现代化,需要使用先进的科技来改进服务,但是由于人的因素,改变来之不易。我们有一批老馆员——我并不持有年龄歧视的观念,但是老观念的存在确是事实——他们并不适应体制上的

任何变化,也没有受过新科技的培训,因此,作为馆长,我需要对这些守旧的态度和专业培训上的欠缺有清楚而敏锐的认识,然后一旦时机成熟,我就果断引进新鲜血液。新人自然而然会带来正面的态度,乐意更新,更能使用新科技来改进馆内的运作。你也许记得,昨天在我的退休告别会上,汪悦进(Eugene Y. Wang)教授建议,如果身体允许,我应该改变主意,留下来继续任馆长。

李若虹:

对啊,他试图说服您别退休了。

郑炯文:

可是年龄不饶人,我在燕京图书馆工作了 22 年之后,我真的老了,我该靠边站,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这才是图书馆得以继续发展、继续改进的硬道理,也是我管理图书馆的哲学。

李若虹:

我的理解是您上任后的头几年里,燕京图书馆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您是不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从传统目录系统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线上系统等方面的转型?

郑炯文:

我们花了整整 7 年清理图书馆长期积压的大量书籍。我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库存。清仓以后我们才明白馆内到底有哪些藏书,哪方面的书籍我们尚需努力争取收藏,哪些方面需要加强。积压的书籍清理、上架后,我们接着开始重整善本部。说到善本部,燕京图书馆确实需要善本特需的一套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馆内缺乏这类专业人员,于是我对馆内的情况作了整体评估之后,决定设立一个访问馆员项目,意在邀请中国具有善本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来到燕京图书馆,帮忙整理。

李若虹: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设置得正是时候。

郑炯文:

当时我走访了中国多家重点高校的图书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对他们的善本书作了评估,然后邀请他们的善本目录馆员来到燕京图书馆,帮我们编出善本目录。与此同时,我还



尽力为这些访问馆员提供从事专业研究的机会,使得他们在做访问馆员的同时也有机会出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一访问馆员项目又启发我着手另一个新项目,那就是善本书的数字化。因此,燕京图书馆的访问馆员和善本电子化项目是紧密相连的。

李若虹:

原来善本数字化项目是这么开始的,我以前并不了解。能否介绍一下访问馆员项目是如何启动大规模的数字化项目的?

郑炯文:

这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3—1975年,我在华盛顿的研究图书馆协会工作时,我的办公地点靠近中国驻美大使馆。每逢晚间和周末,我经常看到从大使馆出来的一些年轻人到附近的商店,对比出售货物的价格。这一经历启发了我。不久,我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参加东亚研究和图书馆学联合项目,但我时常在想,身为东亚研究的专业图书馆员,我们不妨借鉴这一经验来培训中国的图书馆员。于是我就在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一个日本图书馆员来访项目。当时之所以决定邀请日本馆员来访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因为那时只有日本有能力把年轻馆员派往美国访问、进修,而中国实在没有财力这么做。到1986年,我调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就开始邀请中国的图书馆员,来帮我们做大量的编目工作,从而使得学者们开始了解,并充分使用洛杉矶分校的馆藏。从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年的访问馆员项目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

来哈佛燕京图书馆后,我再一次面对积压的大量书籍的编目工作,当时我们都不清楚图书馆到底有多少藏书,于是我再一次启动了访问馆员项目。这一次旨在邀请年轻的、富有潜力的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员来访,帮我们清理积压的书籍并编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图书馆得到了长足发展。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燕京图书馆并没有专业的善本编目人员,因此我邀请的第一批访问馆员就来帮忙整理善本藏书和一批私人信件、老照片、档案材料和私人档案等特藏资料。当这一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这些书籍的数字化工程。因此,在第二阶段,我们就邀请在数字化方面有专长的馆员来访,协助我们的项目。同时,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些访问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吴松弟、南京大学的陈红

民(现在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徐永明等教授也积极参与了我们的项目,将善本书数字化,使得这些富有价值的善本能以电子版形式公诸于世,便于学者使用。参与这些出版项目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至于访问馆员,我们会根据他们的专攻和兴趣来决定他们参与的范围和专题,而他们来访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则在他们自己的名下出版。因此,访问馆员项目确实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双赢项目,不仅有助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运作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来访馆员所属的高校图书馆和馆员的学术研究的拓展。我本人为这一项目的顺利运作倍感欣慰和满足,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年轻的馆员从中国高校来到燕京图书馆,有机会进修并成长,其中不少馆员回去后成为他们所在高校图书馆的骨干。在我担任馆长期间,我也亲眼目睹了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快速发展。这些年来,国内高校图书馆在基建、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和西方高校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在过去的15—20年里,许多高校新建的图书馆大楼的规模已超过哈佛大学。今天,中国高校的图书馆尚需改进的是管理制度和专业技能,而能否做到进一步的发展则取决于年轻一代的图书馆员。这些想法和我一直着手推进的访问馆员项目一脉相承,而能为这一项目起到一份小小的作用,我本人感到由衷地高兴。

李若虹:

技术的更新又是如何在整体上影响您对图书馆的管理?不仅在藏书和服务方面,还有对您作为馆长的管理风格方面的影响。

郑炯文:

我觉得技术上的更新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管理风格。我是一馆之长,但我同时也是燕京图书馆内的普通一员,这是我的工作哲学。因此,我一贯恪守团队合作的办事风格。作为馆长,首先我需要和团队里的每一位互通有无,把取得的每一份成绩归功于为之付出努力的馆员。我一直认为,一位好的图书馆馆长并不一定要掌握图书馆需要的每一种技能。就我而言,我并非善本专家,也不是目录馆员,也不是古籍保存的专家,但是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我努力要做的是使每一位馆员尽其所能,帮我做好我本人并非专长的工作,同时我还尽力为大家创造一



个安心学习和顺利成长的工作环境。

李若虹: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教授咨询委员会将在往后的几个月或一年里物色您的接班人,所以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燕京图书馆往后10年的前景。您觉得哪些方面图书馆将会有进一步的更新?

郑炯文:

往后一段时间里是燕京图书馆的过渡期。简而言之,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一家出色的东亚研究图书馆,藏书数量丰富,质量上乘。我一直强调说,图书馆的优劣在于藏书和服务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对一家东亚研究图书馆来讲,首先,我们需要拥有一批有关东亚研究的藏书,作为我们服务的根基。其次,我们还需提供一流的、个性化的服务。我想,往后10年里我们最需要的是技术更新。科技飞速发展,而我们图书馆仍然是以纸质藏书、资料为主,因此我们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引进更多的电子资源、信息数据库系统、电子版书籍和研究资料等等。我认为这是燕京图书馆今后面临的首要任务。第二个方面牵涉到馆内的服务。这方面我们尚需进一步提高,因为技术的更新使得我们不得不随之改变服务方式。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两方面在将来的10年里会对图书馆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若虹:

这两方面确实都非常重要。我经常在想该如何平衡传统的纸质书籍的需求和飞速发展的电子资源的重要性。对燕京图书馆来讲,这就是如何在善本书和日新月异的电子资源之间达成一种良性的平衡。能不能谈一下您对此的想法?

郑炯文:

确实如此。我们需要经费和资源,需要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但是仅此还不够。技术的更新当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东亚研究的特点,那就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需要依赖于传统的纸质藏书。我们将继续加强纸质藏书,同时也会找到纸质藏书和电子资源间的一个平衡点。对东亚研究而言,这两类资源同等重要。东亚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电子资源,也同样不能在信息时代继续走老路,关键是我们需要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说到善本书,哈佛燕京图书馆确是一个特例。

本馆拥有亚洲之外最佳的中文、日文和韩文善本藏书。这些善本诚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从事数字化的工作,不能把这些珍藏本以电子版的形式服务于世界各地的学者,其真正的重要性又何在?燕京图书馆多年来努力筹资,利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使得燕京图书馆独有特藏的善本以电子版的形式,不仅便于哈佛大学的师生和学者使用,而且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服务。学者即便远离哈佛大学,也能方便使用。

李若虹:

昨天在您的荣休告别会上,怀特纳图书馆数字成像部的负责人比尔·康斯托克(Bill Comstock)特意说,这些年里为燕京图书馆藏善本书数字化的项目,他和您合作非常愉快。能使大量善本藏书以电子版的形式对外公开,便于学者使用,他深感欣慰。几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10年里完成的中文善本典籍数字化工程成为学界的一大新闻,学者们为之振奋。现在,不管身在何方,学者们都能看到燕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这实在是学界的一件大好事!

郑炯文:

完成这一项大工程,我们确实非常高兴,并深深为之自豪。10年里,我们完成了4200条书目,包括60000册善本书的数字化工程。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日文和韩文善本书的电子化项目。我们非常幸运,燕京图书馆拥有最多的日文和韩文善本书。由于这些善本都是以汉字书写的,我们的馆员已经积累了10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处理这一新项目没有任何问题。就怀特纳图书馆数字成像部来讲,康斯托克先生多年来负责处理我们的项目,他的部门已做得得心应手。日文和韩文善本的数字化是一项3年的工程,由于这些善本都属于哈佛燕京学社,因此我们事先得到了学社社长和董事会以及燕京图书馆的教授咨询委员会的批准才着手进行。今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项目不得不暂停下来,不过我希望这一项目能尽快恢复。和怀特纳图书馆数字成像部的同事们合作,我也非常愉快。我们确实非常幸运,因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具有这方面最具实力、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并且学校拥有的丰富的资源足以提供最尖端的仪器、设施和数字化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帮着做善本书的数字化工程,也把老照片、手稿、卷轴字画等转为电子版。



李若虹:

的确,哈佛怀特纳图书馆有最好的专业团队从事最先进的电子数字成像项目。

郑炯文:

话再说回来,这些又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

李若虹:

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在正在做《中国珍稀旧方志》的电子化项目,对吧?

郑炯文:

对的,我得重复,燕京图书馆非常幸运藏有一批上等的中国地方志,是美国收藏中国方志最多的四家图书馆之一。其他三家分别为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至于哪家藏的方志最多,众说纷纭,而我本人从来不会为此争辩。但是,毫无疑问,燕京图书馆的方志藏书确属北美上乘。学界知道,《中国珍稀旧方志》是学者从事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不管在文学、历史还是社会学等领域,因此我们决定和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燕京图书馆藏有1949年之前出版的许多地方志的好版本。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一项目是把重要的方志转为电子版,便于世界各地学者使用。作为图书馆员,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筹资,用于为重要的藏书做电子版,使得世界各地的学者,不管身在何处,都能用上。为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光学字符识别(OCR),来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使得我们的藏书能帮助更多学者从事学术研究。

李若虹:

那么中国地方志的电子化项目将在以后的2—3年内完成吗?

郑炯文:

没那么快。整个项目可能需要10来年呢!

李若虹:

原来这是一个长期项目。

郑炯文:

是的。不管谁来接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我真心希望新馆长会继续这一大项目。

李若虹:

国会图书馆或是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同样也在为他们馆藏的地方志做电子化项目吗?

郑炯文:

每家都努力在做,但是都不如我们燕京图书馆这样大刀阔斧在做。不过,国会图书馆总是声称他们的馆藏最佳,他们的东亚图书馆首屈一指,但是我从来不去费劲争第一。读者、学者心里自然明白。

李若虹:

能否谈谈您担任馆长期间最具挑战和最让您开心的时候?

郑炯文:

最具挑战的要数到校外筹资。燕京图书馆做了很多项目,可是绝大多数经费并非来自哈佛大学,而是来自我们的合作高校和私人捐赠等。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为筹资花去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可以说这是我当馆长最具挑战的一项工作。当燕京图书馆教授咨询委员会商讨下一任馆长该有的资历时,一定要考虑到候选人的筹资能力,否则馆内的很多项目将难以继续。

而最让我开心的是看到图书馆的一个个项目得以顺利完成。让我再啰唆一遍,我们取得的所有成绩都该归功于我的团队。在我50年的图书馆生涯里,最让我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年轻同仁在岗位上取得长进,成为比我要出色得多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再没有别的事儿能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这确实是我发自内心的表白。

李若虹:

确实如此。讲到您在燕京图书馆完成的这些项目,哪一项是您最引以为自豪的?

郑炯文:

清理馆内积压的藏书为第一,然后就是善本数字化项目的顺利完成。我曾经说过,说到电子化时,我们特选图书馆的珍藏善本和馆内独有的书籍和资料来进行,目的是使得世界各地的学者都能了解,并用来进行远程研究。我们做电子化的原则是不花经费和力气在普通书籍上,因为这自有商业图书馆会去做。另外,和数字化项目密切相连的访问馆员项目也让我感到自豪。



李若虹:

是的,这两个项目使哈佛燕京图书馆大大拓宽了服务的空间和对象,使得图书馆能为世界各地的学者服务。当过去藏在地下室的资料得到整理、公开后,学者们就纷纷来到馆内作研究。而数字化项目完成后,许多珍贵的善本就能对世界各地的学者开放。下面能否请您跟年轻一辈的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馆员分享您的慧言?

郑炯文:

30多年前,我曾经应邀到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和信息管理系作演讲,谈的主题是图书馆职业是一门值得敬重的职业。坐在我跟前的一位小伙子说,他是实在需要一份工作才不得已从事图书馆行业,否则他肯定不入这一行。这是很多人对图书馆行业持有的态度,但是我并不这么看。我是图书馆专业科班出身的,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行业,我也为自己一辈子从事东亚图书馆职业感到自豪。我知道,在一些国家人们看不起图书馆行业,但是在我看来,这归根结底在于一个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的。就如中国古话所言:“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我想和年轻一代的图书馆员分享的是,图书馆职业是一门受人敬重的职业,做一名专业图书馆员并没有什么让人抬不起头的。在这一岗位上,最重要的是敬业,完成你的职责,也就是尽其所能为学者们提供他们所需的书籍和资料,协助他们完成学术研究。这就是做图书馆员的最大贡献。如果您能从中得到乐趣,那最好不过,这就是一份合适的职业。否则,你就不必走这条路,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职业。

李若虹:

非常感谢您的忠告。郑馆长,您通过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敬业精神,为图书馆做了很多好事,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感激,尤其是对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们,您总是倍加关照,我们为此深表谢意!

郑炯文:

谢谢您的善意。我反复地说,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团队齐心协力合作的结果,并非我一个人的成绩。

李若虹:

就我本人使用燕京图书馆的经历而言,我亲眼目睹了图书馆在过去20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改进。从当初做学生时到燕京图书馆借书填写一张张白卡和黄卡,到后来坐到洁净、安静的善本部阅览室看档案,所有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藏书的借阅和使用也越来越方便,服务也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有效率。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我们学生、学者和教授、研究人员所做的一切!最后我很想知道,荣休后您给自己安排了怎样的休闲好计划?

郑炯文:

好多人都问我。我先要好好休息一、两周,因为我不用再为燕京图书馆筹资而费力了,然后,我会开始一项10年的阅读计划。头5年里,我会好好重读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多年前我在香港上高中时读过这些名著,但是50多年后再读,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接着5年里呢,我会尽情享受武侠小说。我实在不敢一退休就读武侠小说,因为一旦开始,就会一发不可收,那就完了。退休后,我还会去中国看看,还会和我太太结伴去欧洲旅游。等我完成所有这些阅读计划,读完所有的武侠小说,那我就老得可以回家了。

李若虹:

郑馆长,很高兴有机会和您,还有燕京图书馆的教授咨询委员会成员一起合作,改进图书馆的藏书,使得图书馆能更好地为学生、学者和教授们服务。

郑炯文:

我也是,感谢你这些年里的帮助和合作。

李若虹:

我很荣幸,也很开心有机会向您了解您身为馆长的生涯和燕京图书馆这些年的发展和成果。祝你荣休快乐、安康!

作者单位:哈佛燕京学社,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市,02138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2日

修回日期:2021年4月7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转第28页)